

## 韓國對華關係中的「中國情結」

邵磊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蘇翊豪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政治學博士

### 摘要

本文藉由闡述韓國的中國情結因素如何影響對華關係，補充現有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分析朝貢體制以及情義精神的不足。中國情結脫胎於傳統華夷秩序與朝貢關係中的事大主義，係韓國對於符合中華文明典範的中國政權之情感依託與效忠。然而不同於強調名份尊卑與實力差距的事大主義，中國情結重視中國統治者須具備儒家文明性與對外鋤強扶弱的精神，成為近現代韓國依從中國的重要根源。由於明帝國義無反顧地援助李氏朝鮮抵禦日本入侵，事大主義因而轉化為中國情結，使得朝鮮拒絕向文化低落的滿清低頭，直到滿清展現作為中國統治者應有的儒家形象和字小風範。同理，出於共同抗日的情感與記憶，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交替之際，甚至是後者取代前者在聯合國席位之後的二十餘年間，大韓民國同樣秉持中國情結，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關係直到1992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大陸，也逐漸成為韓國「中國情結」的投射對象。以往被認為與中國大陸關係疏遠的韓國保守黨派，近年也一度表現出親華舉動，這當中既有

國家利益考慮，也不無中國情結的展露。而韓國進步黨派無論在歷史或是在當代，皆會較快接受中國新興勢力，因此在中國大陸看來，韓國進步黨派更爲「親華」。當前的國際秩序是以美國爲主導，作爲韓國盟友的美國對韓國的政治、軍事等影響依然不可替代。不過在韓國制定對華政策時，除了以利益導向進行充分的理性考量後，感性的中國情結或多或少會起到某種程度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中韓關係、事大主義、中國情結、情義精神

\* \* \*

## 壹、序言

2017年12月13日，韓國新任總統文在寅開啓訪華之行。由於近年薩德部署問題致使中韓關係跌入谷底，文在寅的此次訪華有著破冰之旅的意義。也因此，文在寅道盡好話，稱「中國人民是韓國革命先烈的同志」（亞洲經濟2017），以此來拉近中韓之間的情感。而隨著對華外交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韓國外交部有意設立專司對華外交的「中國局」（朝鮮日報2018）。不過，曾向中國過表達深情厚誼的，還有引起薩德風波的朴槿惠。韓國前任總統朴槿惠在上任初期所展現的「親中」舉動，一反中國人對韓國保守黨的認知。甚至朴槿惠上台初期的韓中關係可謂是1992年建交以來的最親密時期。2013年6月27日，甫當選韓國總統的朴槿惠在就任之初，訪美結束後即出訪中國大陸，打破了二十年以來韓國總統就任後「先美國、再日本、後中國」的不成文出訪慣例，中國大陸回以「最高規格」禮遇朴槿惠。2015年9月3日，朴槿惠應邀參加了鮮有西方領導人直接參與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閱兵儀式，中國大陸更是史無前例的將其位列俄羅斯總統普京之後。而朴槿惠當選總統之前，曾以不同身份訪問中國大陸三次，其中2011年韓國總統大選期間，已成爲韓國大國家黨總統候選人的朴槿惠更以大國家黨黨首身份訪華，爭取中國支持的目的昭然若揭。

有趣的是，在外交實務界與理論學術界，一般認爲韓國國內勢力與中國的

關係是「左親華而右斥華」。例如與朴槿惠同樣出身右翼保守黨的前任總統李明博，其主政時期的韓中關係忽冷忽熱，並不穩定，這方吻合韓中兩國外交界與輿論界對於保守黨執政對華關係的預期。然而朴槿惠身為韓國保守黨的典型代表，她一開始與中國關係的親密程度，甚至是極為親左、親北的韓國進步黨執政時期也不能比擬。對此，美國著名亞太問題專家包道格（Douglas H. Paal）指出，朴槿惠同中國發展積極關係，除卻經濟與地區穩定等現實因素外，還有其個人因素考量（徐方清 2013, 71）。儘管包道格並未明言，但所謂的「個人因素」，咸信指向朴槿惠的「中國情結」。

李圭泰（2007, 282）認為，韓國外交普遍存在一種或多或少的「中國情結」。究竟什麼是「中國情結」？「中國情結」是如何產生的？形成於古代的「中國情結」對於韓國當代的對華政策又有什麼具體影響？「中國情結」這個字眼經常出現在中文的報章媒體中，但遺憾的是，學術社群鮮有詳加論述的著作，有鑑於此，本文透過耙梳中韓文著作，系統性地提供一般讀者以及東亞國際關係研究者對於「中國情結」的認識。筆者主張「中國情結」存在韓國文化之中，不因政治黨派的左右分歧而對立。「情結（complex）」一詞，由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最早使用，他形容情結是一群無意識感覺與信念所形成的結，這種情結可以被間接偵測，而表現的行為則很難被理解（Howard 2011, 40）。而韓國人的「中國情結」，就是這種對「中國」無意識的、非理性的、不易被西方人理解的、內化於韓國文化之中的情感。韓國人心中的「中國」<sup>1</sup>，不單純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體，而是把她看作一個有著深厚歷史脈絡和文化底蘊的文明體。韓國人「中國情結」的表現，不僅僅有現實層面的對中國強大政治力的仰仗，對中國繁榮市場的依賴等，還有精神層面的對中國悠久歷史的仰慕，對中國廣袤疆土的敬畏，對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習、以及對中國的情感依託等。歷史上的「中國情結」中，韓國人甚至將「中國」作為我者，韓國人非常在意「誰是真中國」。雖然，西伐利亞體系下

<sup>1</sup> 石之瑜、徐耿胤（2012, 110）探討了「是否有一個可稱為中國的本體」，強調不同地域或民族的研究者都是根據自己的歷史脈絡來認識中國，因此不同學者的中國認識都是不一樣的。

的韓中兩國變為平等國家關係，近代以來在韓國興起的民族主義也將中國作為反抗對象之一，但隨著近年韓中兩國之間政治經濟關係的熱絡，以及雙方軍事敵意的降低，使這種根植於韓民族潛意識中的「中國情結」又逐漸浮上檯面，甚至影響韓國的外交。

弗蘭克爾（Joseph Frankel）指出，理性概念具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與西方人不同的其他地區民族的思維習慣和推理方式都被認為是非理性。<sup>2</sup>然而中國大陸學者王鳴鳴（2008, 227-241）則認為，由於地理環境、歷史經歷、宗教信仰等文化背景的不同決定了思維方式的差異，而思維方式又影響著外交決策。不被西方認可的東方思維，也可以是東方式的理性。本文無意要追究這些具有某個民族或國家的思維方式是否應該被看作是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理性，但韓國外交中的「中國情結」顯然屬於這樣的思維方式。

本文對於國際關係理論與外交研究的貢獻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研究方法上，筆者希望通過歷史學與民族學的角度，在既有框架之外，重新考察韓中關係的發展樣貌與走向，尤其側重把梳貫穿古代朝貢格局與當代主權國家體系的情義精神。其次，時間縱向上，筆者要將研究視角延伸至「明清兩朝—朝鮮李朝」，因為該時期奠定了韓中兩國的現代版圖、形成了今日國族的基本輪廓，與當今兩國的互動模式具有歷史連續性，如此才可一窺歷史發展規律。最後，地理空間上，台灣近年雖在本土化浪潮中不再標榜中國法統，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仍係中國政權之延續，故筆者欲將台海兩岸的兩個政權皆作為「中國」來探討，如此才可以說明韓國對華關係的連貫性。<sup>3</sup>假使「中國情結」確實存續在韓國的對華外交關係史之中，那麼我們照理也能夠在當代韓中關係史重現類似的軌跡。是故，本文寫作目的，也希望透過考察韓國對華關係潛意識中的「中國情結」，來以史鑒今，觀察並展望未來的韓中關係。

本文以時間為軸線，將文章主體分為兩大部分：「歷史韓國的中華抉擇」以及「當代韓國的中國認識與對華政策」。第二節透過介紹古代韓中關係來揭

<sup>2</sup> 轉引自王鳴鳴（2008, 43）。

<sup>3</sup> 何彤梅（2008, 71-76）指出，以往討論韓中關係僅局限於大陸視角，鮮少提到韓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所維繫的長期的友好外交關係。而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兩岸皆以各自的立場和視角來看對韓關係，使得韓中關係的探討過於片面，缺乏完整性。

示韓國對華關係中的一般邏輯：該節首先介紹歷史上的韓中關係，即朝鮮雖為朝貢國，卻在以中國為主導的「華夷秩序—朝貢體制」中位於最靠近中華的位置；接下來論述「事大主義」體制下的韓中如何因現實考量形成盟友關係，卻又使「事大字小」的關係變成對中國非理性的情結，並指出韓國以強烈的中華意識而非現實考量來對抗如日中天的滿清中國；本節最後介紹面臨強大的新中國（清）與沒落的舊中國（明）時，韓國各派勢力是如何抉擇自己心目中的中華。第三節則在論述當代韓中關係時發掘古今韓中關係邏輯的一致性：該節首先回顧韓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指出韓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保持43年之久的外交關係，其背後的考量與明清交替時的「尊明抑清」如出一轍，同樣是基於中華文明的思考邏輯；緊接著，介紹韓國左右各派勢力的對華態度，本文打破當代韓國對華關係中「左親華而右反華」的刻板印象，指出韓國今日的保守派如同古代的「親明派」，是有著更強「中國情結」的親華派；最後指明，隨著中共的愈加中華化，韓國看待中共如同看待中華化了的滿清，「中國情結」會從舊中國轉向新中國。因此本文的結論與前瞻觀察是，韓國保守黨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會日益親密，而中國對韓國的影響力日益增大。

## 貳、歷史韓國的中華抉擇

### 一、如何作中華：從化外到中心

提到韓中關係史，就必須要從「華夷秩序—朝貢體制」開始說起。韓國韓中關係史泰斗全海宗（1966, 10）指出，過去兩千年的韓中關係大部分都與朝貢體系有關。

Fairbank（1968, 1）指出，東亞地區的文明化，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進行的。中國文化的優越性，以「華（中國）」、「夷（化外）」之分作為基礎，從而形成華夷之間階級的、不平等的關係。而這種以中國為主導的「華夷秩序」，從將中國視為世界中心的自民族中心主義出發，將中國作為文明的中心「華」，而把周邊視為落後的「夷」，以文明的程度來確定彼此的地位差別，從而形成位階秩序，其背後是中國儒家的「華夷之辨」思維（白永瑞 2006,

131)。

中國明朝皇帝朱元璋在《奉天北伐討元檄文》中稱：「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Fairbank (1968, 2-3) 根據中國人的這一思想，將華夷秩序以「同心圓」的方式排列出來：以中國為中心，以夷狄為外圍；距華之近遠，又將夷分為「Sinic Zone」、「Inner Asia Zone」、「Outer Zone」，構成「天下秩序」。像朝鮮、越南等使用漢字、接受儒家思想的民族屬於「Sinic Zone」，滿洲、蒙古、突厥等與中國文化相異但不排斥中國文化的周邊民族為「Inner Asia Zone」，地理遠且疏於交往的地方則屬於「Outer Zone」。朝鮮在民族上異於中華，地理位處邊陲，被中國人看作為「夷」，但接受儒家「華夷之辨」思想的朝鮮，則通過不斷的模仿中國禮制，使自己的地位從外圍接近中心。如朝鮮中期官員崔溥在《漂流錄》中表達：「蓋我朝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則不可以外國視也。」（孫衛國 2002, 69）朝鮮雖地處「Inner Asia」，但文化禮制上已被「華化」，因此地位被抬升至「Sinic Zone」，成為最接近中華中心的文明民族。

華夷秩序的實現手段則是「朝貢體制」。Fairbank (1942, 129-130) 指出，華夷之間的外交或貿易是依附在朝貢體制上的，這樣的朝貢體制是以中國文化為其觀念中心的具體表現。而化外民族對朝貢體制的接受，則是基於化外民族對中國文化優越性的認同。這看似不平等的關係，並非是由中國單方面主導形成。夷狄要認同華夏文物之優越、景仰天子之恩德，才能認可中國成為天下的中心，從而歸順天朝禮制，參與朝貢體制（Fairbank 1942, 132-133）。<sup>4</sup> 可以看出，「夷狄」同樣是中國天下秩序中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主體。

「華夷秩序—朝貢體制」在韓中關係的具體體現，則是韓國對中國的「事

<sup>4</sup> 對於「華夷秩序—朝貢體系」的解釋雖有許多觀點，但對於其形式上的描述大都與Fairbank(費正清)類似。爭議最大的，則是關於「華夷秩序—朝貢體系」形成的動機、各國的感觀、國家關係的性質等問題。如全海宗(1966, 6-15)就認為，朝貢關係中，兩國關係比較對等，而非中國學者以往認為的以上對下的「宗屬關係」；韓國維持朝貢制度的原因，是防止其他民族的入侵，最終是為了維護本國的統治與獨立自主，中國學者普遍認為的文化「慕華」則屬於「副產品」而非主要目的，其出發點還是從韓國自身利益為考量。縱使如此，韓國學者也並不否認韓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仰慕，對「華夷秩序—朝貢體系」認識的爭議並不影響中國文化對韓國產生的客觀影響。

大主義」政策。「事大」一詞最初見於《孟子》，<sup>5</sup>與其相對應的概念是「字小」，意思是小國要忠順於大國，而大國要對小國仁義。「事大字小」是儒家處理外交關係的一種理念與策略，即小國為避免遭受大國的威脅，主動臣屬於大國，接受大國的保護；大國雖接受小國的朝貢，但要保護小國的利益不受外來侵犯。對於小國來說，事大主義是一種保國之道，通常是一種委曲求全的策略（孫衛國 2002, 68）。韓國對中國奉行事大主義，大體可追溯至新羅對唐朝的朝貢（王銘 2014, 55）。<sup>6</sup>但若中國出現式微或戰亂，或是兩國交惡等狀況，也會出現朝貢中斷的狀況。可見以朝貢為手段的事大政策，是一種工具性的、策略性的外交手段。

到了朝鮮王朝，事大主義被奉為國策圭臬，無論任何情況下都對中國奉行事大主義。朝鮮初期奉行的「親明政策」，首先是要與明朝形成政治「盟友」，藉中國的力量確保朝鮮的國家安全與自主空間；更進一步則是為了穩固朝鮮初建的政權，以求中國天子對其正統性的認可，來能獲得對內統治的正當性（鄭容和 2006, 22）。比如朝鮮開國國王李成桂在建政初期，請求明太祖為新國家選取國名，<sup>7</sup>一方面藉認同中國皇帝在華夷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來參與中華天下秩序以獲得保護，另一方面則希望透過中國的冊封，讓朝鮮民眾看到自己立國的正當性。又如朝鮮國王駕崩，需明朝賜與諡號才可被後世稱為「王」，以溯正統，否則只能被稱為「君」（如燕山君與光海君皆因政變未獲明朝封號），其統治正當性不被承認（孫衛國 2002, 67）。朝鮮事大明朝，並非出於軍事上、外交上的壓迫，而是出於韓國本國政治上的需要（鄭容和

<sup>5</sup> 《孟子正文》卷二，〈梁惠王章句〉下篇三：「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sup>6</sup> 朝鮮王朝《太祖實錄》總序，辛禡王14年5月條：「以小事大，保國之道。我國家統三以來，事大以勤。」王銘（2014, 55）指出，李朝太祖李成桂追溯朝鮮立國，所說的「統三」即指唐高宗時期新羅統一半島三國之事，「事大」在那時即是指新羅侍奉大國唐朝。

<sup>7</sup> 《明太祖實錄》卷223，洪武25年閏12月乙酉條：「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宜更其國號曰『朝鮮』。」

2006, 8)。可見，以事大主義結成的盟友關係，已從外交目的進一步轉向對內統治考量。向中國請求冊封獲得名義上的統治認可，成為事大主義的主要目標。

韓半島對中國文化與制度對效法雖有兩三千年之久，但這也僅止於對優秀文化的學習，即使將中華文化看作是「我者」，但還不至於將中國當成是「我者」。但這一狀況在朝鮮中期以後有了質的轉變。朝鮮雖「事大」明朝，其王室名號也均須明朝冊封認可，但明朝鮮少干涉朝鮮內政，朝鮮在事大政策下保有高度的獨立自主。16世紀末日本侵略朝鮮的戰爭（壬辰倭亂）中，明朝不惜傾全國之力，歷時七年幫助朝鮮擊退日本，做到「字小」之義。<sup>8</sup>明朝保住了朝鮮卻很快亡國，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朝鮮深感明朝救恩，稱「萬曆再造之恩，將百世不可忘」（《明隱記》卷七）（王克平 2009, 27；孫衛國 2002, 70-71）。朝鮮的事大主義思想達到頂峰，進而對中國產生情感認同。不願認同滿清的朝鮮學者金履安（1722~1791）（1999, 503）稱：「當今之世，不歸我中華而誰也？」；朝鮮末期更有儒學家郭鍾錫（1864~1919）（2001, 645）稱「（朝鮮）天地為大明天地……喚我作大明人」。慕華的意識已變為天然，對中國的意識已上升到將中國看作是「我者」。原本以外交行為來實踐的「事大主義」，在朝鮮中期以後成為道德上的義務（崔鉛植 2007, 110）；原本以政治為目的地韓中盟友，則暗含了更多情義的考量。

朝鮮時期的對明關係，以華夷之辨為邏輯，以天下秩序為準繩，以事大主義為實踐，以中韓盟友為保障。在實踐事大主義的過程中，又以朝貢實現外交事大，以冊封實現內政事大，以慕華實現思想事大，三者相輔相成，又有隨著時間推進遞進發展。從策略性事大，到道義性事大，朝鮮對中國的事大政策從理性出發，漸漸內化為感性思維，成為形成「中國情結」的源頭。

<sup>8</sup> 吳政緯（2015, 82-85）指出，明朝與朝鮮初期的互動並非如後來朝鮮標榜的那般美好，明廷對朝鮮的索求以及明朝對內的高壓統治等都使當時出使中國的朝鮮人頗有微詞。然而壬辰倭亂中明朝的鼎力相助與明清易代時滿人的暴力侵佔激發了朝鮮對明朝的思念。使後來的朝鮮以「只念其好，不述其壞」的「選擇性敘述」方式祭奠明朝。



## 二、誰是真中華：從皇明到滿清

既然朝鮮的對華關係始終貫穿「華夷之辨」的思維邏輯，朝鮮就不得不關注兩個重要的問題：「誰是中華」？中原易主是否具有「中國典範」？而此「中國情結」的現象在明清之交獲得驗證。韓中關係史上，朝鮮王朝與明朝之間的親密程度可謂達到頂峰。可以說，明朝為朝鮮樹立了一個「中國典範」，朝鮮王朝後世對中國的想像皆以明朝為基準。根據眾多史料中朝鮮對明朝的贊美之詞，我們可以勾勒出「中國典範」的圖像，大致可以歸為如下幾點：廣袤的疆域、悠久的文化、文明的禮樂、繁榮的經濟、強大的武力、穩定的社會、睦鄰的外交等。尤其強大的明朝對朝鮮的不干涉與保護政策，是最得朝鮮傾心的根本原因。然而就在滿洲人（即女真人）入主中原、滅亡明朝後，朝鮮對「中國」的態度產生極大的矛盾與變動。

滿洲人發祥於中國東北地域，南與韓國的先祖民族為鄰。歷史上韓國的先祖民族與滿洲的先祖民族之間衝突不斷，高麗王朝、朝鮮王朝對女真人的虐殺超過700年。朝鮮半島中部北部的女真人在接受明朝統治的同時，也向李朝進貢並接受李朝的冊封。韓國人無論是根據本民族的歷史經驗，還是按照中國的「華夷之辨」思維，均認為自己是文明於滿洲的上等民族，而滿洲人是未開化的野蠻人，對滿洲人滿懷鄙視心態。面對滿洲人的崛起與進逼，儘管朝鮮內部不乏疏遠明朝、靠攏後金的呼聲，但基於「華夷之辨」的考量，以及明朝協助朝鮮避免亡於日本的恩惠，朝鮮依然選擇效忠明朝（楊仕樂 2017, 11）。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被韓國人瞧不起的民族，竟然打敗了明朝建立了清朝，成為中華帝國的主宰者，並以武力入侵朝鮮，迫使朝鮮國王行「三跪九叩」之禮臣服滿清。朝鮮難復內心的憤郁與恥辱，雖名義上臣服滿清，但對內則是高舉「尊周思明」的大旗，言必稱「皇明」（于逢春 2015, 13）。

明朝被滿清打敗之初，尚在中國南方一些地區留有殘餘勢力，即「南明」，其中就包括台灣的「明鄭」政權。朝鮮雖名義歸順滿清，但卻長期私下支持南明政權。滿清入關之初，無論是對中原地區的野蠻統治，還是對朝鮮世子入質的苛刻對待，都使朝鮮對初期的滿清充滿仇恨（陳放 2012, 80-81）。面對明、清兩個中國，朝鮮義無反顧的選擇殘明才是中華正統，滿清雖佔據

中國領土卻無中華德行，不承認滿清是中國。如朝鮮英祖朝的領議政俞拓基（1691～1767）曾出使中國覬見清帝，但在日記中卻始終稱清朝皇帝為「胡皇」（吳政緯 2015, 116）。

在朝鮮臣服滿清50年後，滿清收復台灣、平定西南與新疆，一統中國，並迎來了「康乾盛世」。為了拉攏朝鮮對滿清對傾心，滿清對朝鮮亦由入關前的高壓和掠奪逐漸改變為籠絡和懷柔政策。滿清政府減輕朝鮮的朝貢負擔，減徵朝鮮軍糧，特赦朝鮮囚犯，禮待朝鮮使臣，以「撫藩字小」的政策為朝鮮樹立「上國」形象。朝鮮因此出現大批親清勢力，對華政策出現「奉清」與「反清」之爭。朝鮮臣服滿清60年後的1696年，朝鮮發生嚴重的糧食危機，清廷慷慨解囊，賑濟朝鮮糧荒，被視為是朝鮮「清朝觀」改變的轉折點（陳放 2012, 78-91）。

滿清借鑒明朝建立了國家機構，並以明朝的法律為基礎制定了清朝的法律。滿清還開始尊孔、祭孔，推行儒家教育與儒化政治，恢復中華傳統禮樂（陳放 2012, 98）。「華」與「夷」看似以民族區分文明，但其背後是以中華文明作為基準所做出的「文明」與「不文明」之分。朝鮮北學派代表人物洪大容（1731～1785）以「華夷之辨」的角度為滿清辯言：「我東之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諱哉！……我東之慕效中國，忘其為夷也久矣。」（吳政緯 2015, 134）朝鮮雖為「夷」，卻也可以通過效法中國實現「以夷變夏」，滿洲同樣學習並繼承了中國的傳統制度與文化，變野蠻為文明。因此朝鮮英宗朝的領議政李光佐（1674～1740）直指：「清人雖是胡種，凡事極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時……」（宋慧娟 2007, 102）朝鮮開始認可「清承明制」，認可滿清可比皇明，認可清朝是「中國」。

日益強大的滿清愈來愈符合朝鮮人的中國想像，19世紀初的朝鮮出現了學習滿清中國的「北學派」。所謂「北學」，即北學中國，就是接受滿清中國先進文化和制度，借以發展朝鮮的商業、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為目標的實學主義。北學派摒棄視滿清為「夷狄」的看法，認為滿清是對中國歷代思想的兼容並蓄，才使其文化博大精深、社會繁榮昌盛（陳放 2012, 101-102）。作為「中國典範」的滿清，再次成為朝鮮效法的對象。1774年（清乾隆39年，朝鮮英宗50年），朝鮮國王英宗下命，在珍藏明朝賜品的「敬奉閣」旁邊「別

立一閣，以奉清國敕文，上嘉納，命戶曹判書相地始役，名曰奉安閣。」宋慧娟（2007, 103）認為，「敬奉閣」與「奉安閣」的並立，說明朝鮮出現了奉明朝與尊清朝並重的政治態勢，這是朝鮮王廷誠心事大立場真正回歸的重要標誌。

明清交替之際，朝鮮長期處於「誰是中華」的矛盾之中，歷經了「明是中華」、「明亡而朝鮮是中華」、「清據中國而非中華」、「清是中華」的思想轉變。當滿清的統治逐漸符合朝鮮想像中的「中國典範」，朝鮮對滿清的態度，也從「反清」、「疑清」，漸漸轉變為「納清」、「尊清」。原本被迫結成的盟友關係，也逐漸成爲一種理所當然。有趣的是，朝鮮在尊清的同時依然思明，朝鮮一方面效法現實的滿清中國，另一方面又不放棄對明朝中國的思念。吳政緯（2015, 133）指出「尊清」與「思明」並不矛盾。朝鮮尊清，恰恰以思明爲基準，兩者雖有先後，卻都是「中國情結」的體現。孫衛國（2014, 154）進一步指出：「尊周、尊明，即是尊朝鮮自身……」因爲朝鮮的立國理念、政治制度皆由明朝而來，朝鮮以「思明」的方式維護對內統治。可以說「尊清」，一方面是出於對滿清中國外交上的現實考量，另一方面則是將長期以來得不到實現的「中國情結」投射於現實的滿清中國身上去。

### 三、各自擇中華：從兩岸到兩韓

清朝成爲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與之伴隨了幾千年「華夷秩序一朝貢體系」也隨著清朝的滅亡而瓦解。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清政府承認朝鮮的獨立地位，韓國脫離與中國之間的朝貢關係，不僅使韓中走向近代平等國家關係，韓國也被迫與日本帝國、西方強權正式展開外交關係。然而韓中之間的關係卻從未停滯於此，儘管韓國無法再仰賴中國的軍事援助與名分認可，但韓國仍然與中國這個他者盤根錯節（Tikhonov 2016, 83-84）。

中國甲午戰敗，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1895），清廷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不僅使中韓之間上千年的「華夷秩序一朝貢體系」崩析瓦解，更使朝鮮落入日本人之手。《馬關條約》的簽署可謂是滿清對韓中同盟的破壞，清廷不負責任的行爲刺激了朝鮮人對中國認知的改變（白永瑞 2009, 146）。1910年，韓國被迫簽署《韓日併合條約》，韓國淪落爲日本殖民地。在日本的統治

下，韓國不但通過日本接受了以西洋文明為標準的新式文明論，在這種視野下，韓國以日本的眼光重新審視中國，認為中國敗於日本主要原因在於未能文明開化。在西洋文明論之下，無論中華還是小中華都失去了意義，對於正在開化的韓國來說，中華、儒家、中國的古書等等都是有害的東西（王元周 2013, 312）。白永瑞（2009, 146）指出，在甲午戰爭之後，韓國知識社群對華態度產生三種分化：「賤視的中國」、「改革的中國」與「聯合的中國」。第一種人作為朝鮮的激進改革派，他們放棄將中國作為世界文明的中心加以崇尚，反而視其為文明的落伍者，並賤視中國人。他們將日本奉為文明的先驅者，願意接受由日本主導的開化，主張聯日抗華。第二種人則是朝鮮的穩健開化派，他們不僅注意到滿清政府的腐朽，更注意到發生在中國的反抗封建主義革命勢力，他們關心清末的維新運動，更受辛亥革命的鼓舞。這是願意參與中國革命，聯華抗日，在中國的支持下獨立建國的一派。第三種是第一種與第二種的折衷派，他們希望中日韓三國聯合一體，尤其看重中國作為東亞勢力平衡的一極，期待聯合中國平衡日本。這三派在日殖中後期，大致衍變為親日派、親國民黨的進步派、親國民黨的保守派，其對應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1 韓國光復前後各派勢力演變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白永瑞（2009）。

1910年的《韓日併合條約》使韓國淪落為日本殖民地。1911年的辛亥革命致使滿清滅亡，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於1912年成立。為了爭求韓國獨立的韓國革命者，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紛紛流亡中國，與中國一同展開抗日運動。191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下，「大韓民國臨時政

府」在上海成立，這個政府就是今日韓半島南側大韓民國政權的前身。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在財政、軍事等各方面支援韓國人的獨立運動（李圭泰 2007, 272）。韓國的革命派與中國的革命派結成反封反帝的盟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創始人之的申圭植稱：「中國革命的勝利，非但為中國之幸福，也是亞洲之幸福，韓國之幸福。」（王元周 2004, 26）甚至連韓國獨立復國運動的重要指導思想「三均主義」，也是由韓國革命家趙素昂受到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影響而提出的（裴京漢 2004, 64）。韓國留學生或革命者直接參加學生軍，還積極參加了國民募捐運動、討袁運動等中國革命活動。當時的韓國人並不把中國革命當作別國革命，而是當作自己的革命來接受。裴京漢（2004, 229）就指出，這是因為當時的韓國革命者尚有依靠中國的「事大主義」思想。

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東亞，韓國的革命者也產生了不同的政治派別。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支持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還是中國共產黨支持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韓人皆追隨中國各方勢力分別組成盟友，進行獨立運動。東北抗聯領導人周保中在回憶朝鮮革命者的革命活動時指出：「（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整個軍百分之九十是由朝鮮人黨員、團員、工人、農民編成的……七軍差不多也都是朝鮮人……三軍的建立也是朝鮮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岩 2007, 54）北韓建國初期的內閣副首相兼內務省相朴一禹，在中共七大上發言稱，「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也是指導朝鮮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在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中將起決定性作用……中國共產黨的責任不僅是要解放中國人民，還要解放東方被壓迫人民，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就是朝鮮人民的勝利。」（王元周 2004, 29）朝鮮的共產主義獨立運動者也借鑒中國的革命經驗，將朝鮮的革命融入於中國的革命之中，視中國的革命為自己的革命。

然而抗戰勝利後，由於政治立場的分別，中國打響了內戰，主張資本主義立國的國民黨敗退台灣，主張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則贏得大陸。韓半島1945年光復的同時，也因為同樣的緣故在南北分別建國。同樣政治理念的在半島北側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sup>9</sup>與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結為盟友，在半

<sup>9</sup> 本文以「北韓」簡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後文所稱「朝鮮」皆指「李氏朝

島南側的大韓民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結為盟友。世界出現「兩個中國」，也出現「兩個韓國」（或稱「兩個朝鮮」）。兩個韓國以各自的立場，選擇著自己認同的「中國」。

1950年爆發的由兩個陣營直接衝突的「韓戰」，更是使韓國與中國大陸之間形成直接敵對關係。許多韓國民眾視中共介入韓戰為促使韓半島走向分裂的重要因素，中共是韓半島統一的阻礙（李忠輝 2011, 69）。而中共在執政初期的各種政治風波，如「文化大革命」，同樣違悖韓國的中國想像。大韓民國像朝鮮王朝那樣，視中共為滿清，認為中共統治的紅色中國，就好比胡人統治的夷狄中國一樣，只佔據了中國的土地，而未有中華的法統。中共雖統治中原，卻沒有「中國典範」，韓國始終不願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長期以來，在中國大陸談論韓國，抑或是在韓國談論中共都成了一種禁忌。韓國以「中國」來稱呼台灣，以「中共」來稱呼中國大陸（孫準植 2013, 40；李圭泰 2007, 272）。

## 參、當代韓國的中國認識

### 一、對中國的再抉擇：從民國到中共

二戰結束後由美蘇所建立起來的「冷戰秩序」，雖然致使韓國國家分裂，卻也保護著南韓在分裂體制的南半邊建立民主國家、發展市場經濟。韓國不僅是冷戰秩序的受害者，同時也是這一秩序的受益者與利用者（白永瑞 2006, 142-143）。對於韓國來說，與中華民國、美國一同參與的反共盟友，是對抗北韓、中共、蘇聯等北方勢力威脅的最強有力保障。古代韓中關係中的「華夷秩序」，實際上以「文明」與「不文明」來區分對立面；而「冷戰秩序」中的反共盟友，也同樣以「民主、自由」的「文明」理念，來抵抗共產主義「極權、專制」的「不文明」行經。在立國理念、統治正當性與外交道義上，參與「冷戰秩序」與融入「華夷秩序」有著異曲同工之效。

---

鮮王朝」。對於「大韓民國」或不明確區分南北韓差異時，本文簡稱之「韓國」，需要與北韓作對比時稱其為「南韓」。

韓中同受日本侵略，同因共產政權而使國家分裂，韓國與中華民國可謂是一對苦命相連的難兄難弟。因此韓國對中華民國的外交考量，與其說最首先是基於國際關係的平衡，到不如說是來自於兩政權在反抗外敵的鬥爭過程中所結下的血盟關係。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在抗戰勝利後曾這樣回憶：「抗戰八年來，臨時政府隨貴國政府遷渝，舉凡借撥財政時，供應軍備以及維持僑民生活，均荷於經濟百度艱難之秋，慨為何潤……似此義薄雲天，是九等吾三千萬民衆當永感不忘者也。」<sup>10</sup>這樣的表達堪比壬辰倭亂後，朝鮮宣祖國王對明朝「再造之恩」的感激。尊明即是尊朝鮮自身（孫衛國 2014, 154），親中華民國，其實也是在確立大韓民國自身的統治道德。強調自身的統治合法性，在半島南北分裂、以及南韓內部也存在廣大左翼支持者的當時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中華民國的「反攻大陸」，如同朝鮮支持的「反清復明」，這樣的立場也同樣影射著韓國自己統一北韓的心願。

韓國學者認為，韓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關係，是與一般國際關係無法相比的「唇亡齒寒」的親密關係，中華民國是韓國唯一的「兄弟之邦」（李圭泰 2007, 271）。金九次子、前駐華大使金信在其回憶錄中表明，儘管外人普遍將其派駐台灣視為從權力中樞流放，實際上他是懷著感恩中華民國與彭湃的心情，擔任朴正熙與蔣中正總統之間的溝通橋梁（金信 2015）。韓國著名歷史學家、原高麗大學校長金俊燁教授於1963年出版的《中國最近世史》，成為韓國戰後首個全面介紹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金俊燁 1963）。「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才是中國正統」是該書最基本的觀點，而這一立場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成為在與中國大陸建交以前韓國的「中國觀」（裴京漢 2004, 232）。中華民國雖不再有廣袤的土地，但台灣經濟的繁榮發展，政治的相對民主，以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對中國傳統的傳承，某種程度上符合韓國想像的「中國典範」。<sup>11</sup>在明清交替、民共交替兩次中國改朝換

<sup>10</sup> 轉引自李岩（2007, 55）。

<sup>11</sup> 韓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孫準植（2013）對韓國與遷台後的中華民國政權之間的外交關係，尤其是兩者的斷交過程做了全盤的回顧與整理。文中雖未直接提到兩者斷交過程中韓國對中華民國的情感動態，但作者本身的用詞與敘事手法卻深深地反映著當時韓國與那一代人對中華民國難以割捨的複雜感情。

代之時，韓國都選擇了同樣是在台灣的中華餘脈作為「中國」。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中華民國獲得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面對「兩個中國」的選擇矛盾，包括韓國的盟友美國在內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均在1980年代以前陸續與中國大陸建交，但韓國依然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直至1992年。中共，一方面是時刻威脅自己的北韓的盟友與支持者，另一方面又是世界所認可的中國。面臨這樣的尷尬處境，韓國也在懷疑和防備中開始緩和與中共之間的關係（王恩美 2011, 201）。韓國是與中華民國斷交的最後一個亞洲國家，如此之晚才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側面，反映的是韓國與中華民國特殊的盟友關係、韓國人忠誠義氣的性格、以及韓國對「中國」的感情。因此就有韓國學者稱，韓國對中華民國是「仁至義盡」（朱立熙、文興鎬 2015, 88）。

然而如同「夷可變夏」一樣，共產國家也會有出人意料的變化。隨著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西方共產國家全部倒台、民主化，中共政權隨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逐步走向政治開明與經濟繁榮。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天安門事件」，飽受港台地區以及西方國家的指責與批評，但在韓國卻並未引起較大關注。因為任期將至的盧泰愚政府為謀求盡快與中國大陸建交，並寄希望於中共支持韓國加入聯合國，因此對該事件進行了冷處理。與港台及西方的悲觀論調不同的是，韓國認為天安門事件反而促使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鄭竣晔 2014, 207-233）。另外，1980年韓國才剛經歷了全斗煥政權鎮壓學生運動的「光州事件」，1987年又在鎮壓兩名大學生致死後發生「六月抗爭」，持續爆發並鎮壓學生運動的韓國也未有太多心力和政治道德來指責中共（鄭在浩 2011, 123）。以2009年「對中國的想像」訪問調查結果來看，韓國人對「天安門」一詞並無負面觀感（董向榮、王曉玲、李永春 2010, 114）。總體說來，天安門事件並未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給韓國留下太多對中國大陸的負面印象。反而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國大陸的思想氛圍從共產主義轉向具有中國性的民族主義（Zhao 2004, 8-10），這也使韓國所看到的中國大陸少了一份共產（夷）的形象而多了一份中國（華）的形象。與此同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逐漸放棄代表中國的想法，台灣本土意識與獨立意識的興起更加速台灣脫離中國。無論在地域上、國力上、思想上，偏安



一隅的中華民國儼然已經脫離韓國對中國的想像。1988年，韓國時任外長崔侑洙宣佈：改稱「中共」為「中國」。改稱「中華民國」為「台灣」。成均館大學李熙玉教授認為，由於韓國骨子裡的「小華主義」思想，使得韓國要不斷分辨誰是中國（洪德和 1998, 46-75）。國際環境與中國因素的改變，都使得韓國再次做出「誰是中國」的選擇。

為了緩衝來自北韓的威脅，以及促進南韓對外貿易的擴張，韓國總統全斗煥（任期1980～1988）、盧泰愚（任期1988～1993）積極推動與共產國家，尤其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北方外交」（詹卓穎、傅濟功 1988, 186-187）。1978年以後在推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中國大陸注意到韓國的出口主導型發展戰略，從而加強與韓國的經濟合作，希望韓國成為經濟合作夥伴（李明 1998, 156）。透過1986年漢城亞運會和1988年漢城奧運會，韓國與中國大陸的文化體育交流日漸增多（朴斗福 1999, 65）。1991年，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大陸）支持韓國與朝鮮同時加入聯合國（何彤梅 2008, 64）。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已具備充分的經濟、文化、政治基礎。1992年，韓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韓國透過建立外交關係，來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

清朝雖為夷狄佔據中原，但經過「北學派」的思辨，使朝鮮對滿清的態度從「反清」、「疑清」漸漸轉變為「納清」、「尊清」；中共雖以共產盤據大陸，但經過「北方外交」的政策轉變，使韓國對中共的態度，也從「反共」、「疑共」漸漸轉變為「納共」。至於是否「尊共」，還需要韓中關係再經歷更長的時間才可以看出。

## 二、韓國的左右分歧：從親左到親華

呈上所述，韓國的中國情結呈現循環現象，這種現象一方面伴隨著中國政權的變遷與轉質，另一方面也與韓國國內各勢力的認知與意識形態差異相關聯。保守與進步，是韓中關係中不可忽略的影響因素。明清交替之時，開明的「北學派」主張學習滿清，而保守的「思明派」尚還殘留反清復明的餘念。清民交替之時，進步的「革命派」主張追隨中華民國建立共和，而保守的「保皇派」則反對廢除帝制（王元周 2004, 28）。民共交替之時，進步的「共產派」主張

與中共結盟建立社會主義，保守的「共和派」則主張維持與中華民國的盟友建設資本主義。可以看出，面對中國的重大變革，韓國的進步派會較早做出思想調適，追隨中國的新興勢力；而韓國的保守派則會在中國的新興勢力長期執政後，顯示出穩固的統治才能才會轉向支持它。今日的民主韓國也依然區分進步與保守兩大勢力。

南韓外交屬分裂國家的外交政策行爲，進步與保守兩大勢力的最根本差異在於對北韓政策。（劉德海 2009, 2-3）保守黨對北韓採取的是對抗政策，而進步黨則是友好、合作、援助的策略。進步黨政府推動與北韓交往的路線，力圖與平壤構築友好關係，此點使得對北韓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大陸，在韓國對外關係方面的重要性大爲提升，韓中關係因而在進步派執政十年期間大爲強化。在進步黨執政期間，韓國的中國大陸政策因雙方對北韓政策的高度同調，故無論在政治、安全或經貿等方面，韓國與中國大陸幾乎都是聯手對付美日的局面（李明峻 2013, 77）。但以李明博爲代表的保守黨執政之後則出現了明顯的轉向，韓美關係迅速修復並不斷強化，韓朝關係不斷惡化，韓中關係也頻起波瀾（王簫軻 2015, 83）。

中國大陸認爲，在對外政策方面，保守黨是親美、反華、抗北的政策；而進步黨則是反美、親華、聯北的政策（李忠輝 2011, 73）。在韓國對華關係方面，「左親華而右反華」成爲中國大陸的普遍印象。但中共政權具有雙重性質：「中」即是「華」，「共」即是「左」，中共既代表中國，同時也標榜左翼。於是，韓國進步派的親中共，更多的是親左；而保守派的反中共，並非是真的反華，而是反左。當中共把自己標榜爲「華」的時候，韓國保守黨對中共的不支持就被中共政權看作爲「反華」。但保守黨又是否真的反華？

「華」不僅僅指代中原政權、中華民族，更多的是指代中國文化。韓國對「華」對態度，要先觀察韓國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才可以窺視韓國左右派的立場。長久以來，以中華文化爲圭臬的韓國一直把漢文<sup>12</sup>作爲國文，直到1443年韓文才被創制出來，即使這樣，韓文也被視爲低賤的文字而不被知識階層使用。但在韓國獨立運動期間，韓國人爲建立起文化獨立的意識，將韓文視爲

<sup>12</sup> 漢文並非是中文，而是指書面語的文言文。中文是指中國人以口語表達的行文。

本民族獨特性的標誌。到1945年韓國光復以後，共產政權的北韓徹底廢棄漢字，主張「韓文純用（即單純使用韓文）」的主體語文政策；<sup>13</sup>而在南韓，雖長期以「國漢混用（即韓文與漢文並用）」為語文政策，但南韓進步派一直主張與北韓相同的「韓文純用」政策，以此達到去中國化的目的，而保守派則相對主張保留使用漢字（金正剛 2002；邵磊 2013）。從文化層面可以看出，韓國進步黨有著打破傳統、建立主體意識、擺脫他族文化陰影的革新意識；而保守黨<sup>14</sup>則與其相反，他們相對重視傳統文化的保存，雖政治上希望擺脫中國陰影，但文化上依然保持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崇敬。比如精通漢語的前總統朴槿惠，其實是從父母那耳濡目染習來的（搜狐網 2013），她的父親正是被中共喻為「反華急先鋒」（鳳凰網 2015）的保守派大佬，韓國前總統朴正熙，而朴正熙本人卻寫得一手好字和漢詩。朴槿惠鐘情於中國哲學，並時常將《論語》等中國古典著作備於枕邊。她還把中國名著《三國志》中的趙子龍稱為「初戀」，每次在中國的演講都盡顯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仰（羅敏球、姜夢 2015，52）。

韓國保守派對台灣的親近，固然有政治盟友以及意識形態相近的原因。然而把中國看作文化體時，1990年代以前的中華民國可謂是中國文化最好的代言人，親中華民國恰恰是「親華」的體現，遲於與中華民國斷交恰恰是「忠華」的表現。中國大陸在談及現代韓中關係時，皆以1992年為起點，台灣關注更多的是1992年以後的「台韓關係」；新一代的韓國人也漸漸淡忘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曾經代表整個中國。於是，中韓兩國所認識的「韓中關係」皆是斷續的。有趣的是，在韓國的華僑，<sup>15</sup>會將中華民國與韓國斷交稱為「中韓斷

<sup>13</sup> 在北韓，作為共產黨指導思想的「主體思想」，是相對於「事大主義」而提出來的。主體思想的核心就是要獨立自主，反對事大主義。其語言政策被稱為「主體的語言思想」，也是以建立具有朝鮮民族獨特性的語言政策為目的，反對使用漢文與漢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 1971）。

<sup>14</sup> 也並非所有的韓國保守黨人都一定是保守中華文化的，這是由於保守黨人士來源多元所致。如前圖所示，有部分存有「賤視中國」意識的人士有相當一部分分化進入了保守黨。保守黨亦有不少草根出身，未有政治世代傳承的人士，如李明博即是，這些人士的中國觀與傳統保守黨的中國認知亦有差別。

<sup>15</sup> 韓國華僑原籍大多數為中國大陸山東省，來韓已超過三代，但他們卻是世界上少有的依然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作為中國國籍的海外僑民。韓國華僑群體具有強烈的中國國家

交」，這與台灣方面的說法相同；而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韓國建交稱為「中韓建交」，這與大陸方面的說法一樣。中韓之間的關係，一斷一建，相當於沒有斷，斷的是政權關係，而中國作為「國家」未曾與韓國斷過外交關係。在大陸與台灣的中國人，都無法感覺到韓中關係的持續性，因為大家都站在各自政權的立場看問題，然而對兩岸皆有國家認同的韓國華僑，反而能夠感覺到韓中關係的承接性與持續性。

正是因為韓中文化之間的親緣性，韓國政府現在在以人文和歷史的相通性作為紐帶來強化對中國的親近與合作（金珍鎬 2013, 15-16）。中國韓國史研究會前秘書長李敦球甚至認為，韓中關係在經濟和人文交流領域已經達到甚至超越了「盟友關係」（金漢權 2015, 4）。文化親近與歷史淵源是韓中關係中不可或缺的考量部分。

從文化的角度來說，韓國的保守派好似朝鮮時期的思明派，他們有著毫不弱於進步派的濃濃的「中國情結」。如同面對明、清兩個中國，我們不能把支持任何一方的朝鮮人稱為親華或反華一樣，韓國的進步派與保守派皆非反華，只是對中國的不同政權、立場、或具體政策的態度不同而已。隨著中國大陸實力的持續上升和中韓相互依賴的繼續發展，韓國左右政黨的外交路線差異將在對華政策方面體現得越來越少（王簫軻 2015, 84）。

### 三、中共由夷變中華：從納共到尊共？

中國大陸自身的改變，是韓國對華態度轉變的關鍵因素。韓國學者金興圭（2013, 204）依時期將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分為毛時代的「傳統抵抗型」、胡溫時代的「發展導向型」、習近平時代的「新興大國型」三個階段，其性質分別是「傳統強國」、「地域強國」和「世界強國」，而這三個階段的對韓國政策則被認為是「非友好關係」、「外交爭取對象」與「積極包容（或排擠）」。中共在不同階段的意識形態、政黨性質以及對韓政策是不同的，韓國

---

觀念，早期的政治立場極度擁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中國政府，在民進黨上台冷淡對待韓國華僑之後，該群體開始兩側支持。原韓國僑界領袖韓晟浩更將國籍由中華民國換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此的反應也是相應變化的。

1980年代以降，中國大陸在共產意識形態上鬆綁，並逐步擺脫共產主義形象，近年來不僅開始復興中華傳統文化，更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儒家化。如今的中國共產黨更像是一個長期執政的保守黨，中國大陸步入中國化、儒家化、去極左化的「以夷變夏」階段。這對於韓國保守黨的對華政策來說，不但沒有「反共」的矛盾，反而具有共同的保守理念。<sup>16</sup>朴槿惠執政之初積極擁抱中國，就是因為基於「中國變化論」（金興圭 2013, 193）。以朴槿惠為代表的韓國保守黨所展現出的親中國大陸態度，可以說是將「中國情結」投射到中國大陸的嘗試。

自朴槿惠上台以來，韓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愈發關注在政治影響力與經濟繁榮這些正面的方面，而與韓國有爭議的歷史問題、以及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環境問題等負面的報導則比重很低（徐玉蘭 2015, 301）。從這個側面可以看出韓國社會對中國大陸的評價愈發積極。在那個熱絡的階段，韓中之間甚至開始就是否能夠結成同盟關係而展開熱烈的討論（金漢權 2015, 4）。朴槿惠有意提升韓中關係，首先是由於經濟上的需要；其次，是考慮到北韓核武問題和東北亞安全（李明峻 2013, 79）。中國大陸與北韓之間的親密程度雖大不如前，輿論<sup>17</sup>也越來越不利北韓，但中國大陸官方依然未能割捨與北韓間的盟友關係。韓國國立外交院教授金漢權（2016）針對2016年年初的北韓導彈危機指出，韓國對於中國大陸有自己的國家利益與政治立場應表示理解，中國大陸突然將北韓由朋友變敵人是容易的，韓國應慢慢說服中國，使其轉變立場。

在面對韓國最核心的「南北韓統一」問題時，已經開始有韓國學者寄希望於中國大陸，並認為現在的中國大陸已經開始轉向支持自己的立場。韓國

<sup>16</sup> 但不得不說明的是，韓國對中國大陸依然有疑慮的點，大致有歷史詮釋問題，政治制度問題，對北關係問題等，對北關係又是重中之重。（鄭鎔碩 2014）這也是目前韓國不可能像對明朝、對中華民國那樣傾心對重要原因。這一點與朝鮮對滿清的疑慮亦頗有相似之處。

<sup>17</sup> 具有中國官方背景之香港中評社（2016）發表了一篇名為「朝鮮擁核自重沒有出路 政權岌岌可危」的社論，被看作是中共放出的棄朝風聲。

《東亞日報》(2014)有報導稱，朴槿惠訪華期間就北韓議題詢問習近平意見，朴問習「危機狀況下中國是否有計劃將北韓以『東北第四省』編入中國版圖」，習近平回答「沒有那樣的可能性」，朴又向習分享了「南韓主導統一的意見」。在這篇報導中，習並未對朴槿惠的「南韓主導說」做明確表態，但徐相文(2014, 92)卻將其解讀為「習近平表態支持南韓主導統一」。有關中國對韓影響力的問卷調查中，認為中國對韓半島統一的作用「非常重要」的民衆從2008年的25.3%急速上升為2011年的43.2%(李相信 2011, 129)。筆者以為韓國輿論越來越認為中國對自己變得友好，而這樣的觀點顯然是基於韓國自己對中國好感的提升做出的判斷，這之間的轉折意味著韓國不僅僅已經認可中國大陸的中華文化代表性，更寄望對方能夠落實情義精神。儘管韓國認為因中共介入韓戰致使國家未能統一，但假使中國大陸一改縱容北韓的態度，協助韓國達成統一，那麼韓國舉朝便將有如朝鮮思明派一樣感激中國大陸。

成為新的「中國典範」的中國大陸，成了韓國「中國情結」的投射對象。韓國與中國大陸之間雖尚未形成盟友關係，但前總統朴槿惠在執政初期所表現的親近中國的態度證實韓國保守黨是有可能轉向親中的，因為這也是原本「中國情結」的真實展露。韓國保守黨與中國大陸的間歇摩擦不可能終止，尤其韓國的同盟、亦與中國有著結構性矛盾的美國也是一個重要變數，但朴槿惠這樣的親華保守派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

是故，文在寅於2017年訪華時，不僅訪問位於重慶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更稱「在中國每一寸土地上都有我們愛國先烈的鮮血與靈魂……在那不義與壓迫中有我們的同志中國人民的友誼！」(亞洲經濟 2017)他一方面認可中國大陸是抗日時期幫助韓國獨立建國的國民政府的繼承者，另一方又似乎是在喚醒韓國人的「中國情結」。對於「尊共」，韓國進步派可能已經沒有疑慮，而韓國保守派或將繼續喚醒其「中國情結」，並在懷疑中繼續嘗試與中國大陸建立親密關係。

## 肆、結論

雖然華夷體系下的朝貢關係在今日看上去是一種不平等的關係，<sup>18</sup>但在當時的國際秩序中，則是一種相對穩定、和平、友好的盟友關係。無論是封建時期、抗戰時期、乃至冷戰時期，這曾經父子般的、兄弟般的盟友關係，是由兩國相鄰與體量不對等的客觀因素所決定的。不過中國的鄰國有很多，曾經與中國建立朝貢關係的國家也不少，但唯有韓國與中國維持著六百年鮮少中斷的盟友關係。這種盟友關係或存在於韓中兩個完整的國家體制之間，或存在於韓中不同政權或不同黨派之間。究其原因，對文化中華仰慕與對政治中國倚靠的「中國情結」是維繫韓中關係持續不斷的因素。

「中國情結」對於個人來說是單純的內心情感，但對於國家來說則是經過悲壯慘烈的鬥爭凝結在整個民族心靈深處不被喚醒的歷史記憶。「中國情結」是投射於「中國」身上的情感，但是中國改朝換代之時，常常出現多個自詡為「中國」的政權。於是韓國以「中國典範」為基準，選擇「誰是中國」。韓國對「中國典範」的想像，一方面是中國要足夠強大和文明，另一方面是中國不能侵犯韓國，且能夠義無反顧地保護韓國，如同壬辰倭亂中明朝對朝鮮的保護。與典範的中國結盟，才能維護韓國安全與發展的保障。

二戰後面對沒有「中國典範」的時期，韓國將這種大國想像投射於美國身上，與美國形成政治與軍事同盟，文化上也追隨美式風潮，儼然「事大主義」在今日的翻版。然而從現實層面考量，同樣是「事大」，韓國加入「冷戰體系」與加入的「朝貢體系」的動機、地位、結果是有很大差距的。「冷戰體系」中，韓國的加入可謂是被迫陷入美蘇大國爭霸的漩渦，韓國不但作為棋子被美國推向反共的最前線，其軍權更完全被美國掌控，政治受美國牽制，因美國的介入反而使韓國無法統一，韓美關係看似平等其實卻非常不平等（劉銀萍 2000, 244-245）。而在「朝貢體系」中，朝鮮充分考量本國利益主動加入由明朝主導的「華夷秩序」，朝鮮雖在禮節上尊奉明朝，遇到共同的敵人時需要朝鮮協同作戰，但明朝也同樣堅守保護朝鮮不受侵犯的責任，並且盡量不干預朝

<sup>18</sup> 有些韓國人將歷史上的朝貢體系當作是一種屈辱（蘇世岳 2010, 162）。

鮮的內政，朝鮮在「華夷秩序」中亦被周邊民族奉為「上國」，韓中關係看似不平等其實反而把朝鮮的地位抬得很高。如同韓國延世大學史學系教授白永瑞在一次演講中所表達的那樣，<sup>19</sup>他傾心於朝貢體系中的「多元中心」模式，<sup>20</sup>以此抬升韓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筆者無異於討論韓國是否產生另類的「美國情結」，也不否認美國仍將長期影響韓國的政治與文化。但美國的強勢主導與中國的近悅遠來注定使韓國對兩者之間的感情不會一致。因此白永瑞說：「美國好似一隻老鷹，看似遙遠卻潛在攻擊的威脅；中國如同一隻大象，看似龐大卻溫順又安全……」<sup>21</sup>韓國雖然享受著韓美盟友帶來的安全，也時刻感受著來自美國霸權主義的威脅；中國大陸若與韓國站在一起，中國會是韓國安全的最強有力保障。

「中國情結」雖源自「事大主義」，但卻超脫於「事大主義」。中國對韓國的影響，不僅僅是政治與軍事上的，更有著語言、文化、思想、禮制、情義等精神層面的滲透，「中華」甚至成為韓國人潛意識中的思維邏輯。以民族學視角來看，文化是民族的核心，是民族性的重要體現。在西伐利亞體系中，中國顯然是毫無爭議的他者；但從韓民族的文化思維出發，中國依然是一個介於本國與外國的中間存在，源自中國的漢字漢文、儒家思想、漢傳佛教等，依然是文化韓國的我者。作為民族國家的今日韓國雖不再如歷史上那樣言必尊中華，但作為歷史沈澱留下的「中國情結」，卻依然殘留在韓民族的潛意識之中。

（收件：105年7月18日，接受：108年4月11日）

<sup>19</sup> 白永瑞（2014.11.19），演講題目：「中華與去中華的文化政治：重看『小中華』」，「蔣中正先生系列演講」，國立政治大學。

<sup>20</sup> 雖然Fairbank（費正清）將華夷秩序下的朝貢體系比作是同心圓結構，但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並非是由中國單一主導運作，同時還存在著附屬的小型朝貢體系。如朝鮮在向中國朝貢的同時，女真也同時向中國和朝鮮朝貢，女真也奉朝鮮為「上國」。女真與朝鮮之間又形成一個中國外圍的小型朝貢體系，朝鮮成為中國之外的另一中心（Fairbank 1968）。

<sup>21</sup> 同註譯19。



# Korea's Chinese Complex and the Evolving Sino-Korean Relations

*Lei Shao*

Post-doctoral Fellow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Yi-hao Su*

Ph.D.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 Abstract

What is “Chinese Complex” and how does it affect Korea’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China? We examine the effect of Chinese Complex by using the salient historical analogy between the Ming-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e conceptualize Chinese Complex as the persistent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a legitimately civilized Chinese reign with Confucian ethical responsibility. The distinctive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 fostered the idea of China Complex and its forerunner, principle of *Sadae*, meaning “serving the great.” The principle of *Sadae* dictates how small countries adjust their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 to major powers for survival, whereas Chinese Complex implies spontaneous behaviors based on indebtedness from favors received from big countries. As a result of Chinese Complex, although it is advantageous to be allied with the newly established Chinese regime, Korea does not shift its allegiance until the incumbent Chinese ruler demonstrates a Sinicized orientation and a sense of brotherhood. The implication of Chinese Complex is that after perceiving the

P.R.C's growing legitimacy to rule, South Korea will seek a higher level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P.R.C.

**Keywords:** Sino-Korean Relations, Sadae, Chinese Complex, Spirit of Brotherhood

## 參考文獻

- 于逢春，2015，〈17世紀中期以降中日韓(朝)諸國「華夷觀」衍變與「華夷秩序」再構築〉，《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6）：11-26。Yu, Fengchun. 2015. "17 shiji zhongqi yijiang zhong-ri-han(chao) zhuguo 'hua-yi guan' yanbian yu 'hua-yi zhixu' zaigouzhu" [Evolution of 'Hua and Yi Concept' and Rebuilding of 'Hua and Yi System' among China, Japan, and South and North Korea since the Mid-17th Century].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36(6): 11-26.
- 王元周，2004，〈在中國的韓國獨立運動人士對中國革命的認識〉，《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7(3): 26-29。Wang, Yuanzhou. 2004. "Zai zhongguo de hanguo duli yundong renshi dui zhongguo geming de renshi"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Personage of Korean Independent Movement within China]. *Journal of Henan Radio & TV University*, 3: 26-29.
- 王元周，2013，〈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Wang, Yuanzhou. 2013. "Xiao zhonghua yishi de shanbian: jindai zhonghan guanxi de sixiangshi yanjiu" [The Evolution of Little Sinocentrism (Sojunghwa): The History of Thought of Modern Sino-Korean Relations].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王克平，2009，〈朝鮮與明外交關係研究〉，延吉：延邊大學博士論文。Wang, Keping. 2009. *Chaoxian yu ming waijiao guanxi yanjiu* [The Study o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Ming and Korea]. Yanji: Ph.D. Dissertation, Yanbian University.
- 王恩美，2011，〈1971年「中國代表權」問題與韓國政府「中國政策」的轉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6：171-220。Wang, En-mei. 2011. "1971nian 'zhongguo daibiaoquan' wenti yu hanguo zhengfu 'zhongguo zhengce' de zhuanbian" [The 1971 Issue of China'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 and the Change in Korea's China Policy]. *The Journal of History, NCCU*, 36:

171-220.

王鳴鳴，2008，《外交政策分析：理論與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Wang, Mingming. 2008. *Waijiao zhengce fenxi: lilun yu fangf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王銘，2014，〈唐代東北亞國家的「華夷」觀念複製〉，《國際政治科學》，14(3)：33-85。Wang, Ming. 2014. "Tangdai dongbeiya guojia de 'hua-yi' guannian fuzhi" [The Replication of Hua-yi Idea among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Tang Dynasty].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4(3): 33-85.

王簫軻，2015，〈試析韓國國內政治因素對中韓關係的影響〉，《韓國研究論叢》，1：78-91。Wang, Xiaoke. 2015. "Shixi hanguo guonei zhengzhi yinsu dui zhong-han guanxi de yingxiang" [The Effect of ROK's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to China-ROK Relations]. *Collected Papers for Korean Studies*, 1: 78-91.

中評社，2016，〈朝鮮擁核自重沒有出路 政權岌岌可危〉，<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7&kindid=0&docid=104124283#rd&sukey=014c68f407f2d3e115d27f247b7e04b1202bd00cbfd3382567c16153e3e272b83602dc1fb603c6a3fc427b63b0160b04>，查閱時間：2016/02/28。CRNTT. 2016. "Chaoxian yonghe zizhong meiyou chulu, zhengquan jijikewei" [North Korean Regime is Dangerous because of its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Accessed on February 28, 2016).

石之瑜、徐耿胤（서경인），2012，《恢復朝貢關係中的主體：韓國學者全海宗與李春植的中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Shih, Chih-yu, and Gyoeng-in Seo. 2012. *Huifu chaogong guanxi zhong de zhuti: hanguo xuezhe Quan Haizong yu Li Chunzhi de zhongguo yanjiu* [*Confronting the Middle Kingdom: The History of Tribute System Revisited through Jeon, Hae-jong and Lee, Chun-sik*]. Taipei: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and Cross Taiwan-Strait Relations.

- 白永瑞 (백영서), 2006, 〈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思想》，3: 129-150。Baek, Yeong-seo. 2006. "Dongya diyu zhixu: chaoyue diguo zouxiang dongya gongtongti"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From Empire to Community]. *Reflection*, 3: 129-150.
- 白永瑞 (백영서), 2009, 《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台北：唐山出版社。Baek, Yeong-seo. 2009. *Sixiang dongya: hanbandao shijiao de lishi yu shijian* [East Asia as Intellectual Thought: History and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orean Peninsular]. Taipei: Tonsan Publications Inc.
- 朱立熙、文興鎬 (문흥호), 2015, 《台韓外交關係史 (1949-2012)》，知韓文化協會。Zhu, Li-xi, and Heung-ho Mun. 2015. *Taihan waijiao guanxi shi: 1949-2012* [History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aipei: Korean Studies Academy.
- 何彤梅, 2008, 〈中韓政治外交關係研究 (1945-2007)〉, 延吉：延邊大學博士論文。He, Tong-mei. 2008. *Zhong-han zhengzhi waijiao guanxi yanjiu: 1945-2007* [Th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Yanji: Ph.D. Dissertation, Yanbian University.
- 李明, 1998, 《南北韓政經發展與東北亞安全》，台北：五南。Li, Ming. 1998. *Nanbei han zhengjing fazhan yu dongbeiyi anqua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 and South Korea and the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Taipei: Wu-Nan Book Inc.
- 李明峻, 2013, 〈韓國的中國政策〉,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9 (4): 63-85。Li, Ming-jun. 2013. "Hanguo de zhongguo zhengce" [Korea's Policy toward China].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9 (4): 63-85.
- 李忠輝, 2011, 《20世紀80年代韓國民族主義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Li, Zhonghui. 2011. *20shiji 80niandai hanguo minzu zhuyi yanjiu* [The Study on Korean Nationalism in the 1980s].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李岩, 2007, 〈試論朝鮮近代對華觀的嬗變〉, 延吉：延邊大學碩士論文。Li, Yan. 2007. *Shilun chaoxian jindai duihuaguan de shanbian* [Korea's Changing Perspective on China]. Yanji: MA Thesis, Yanbian University.

- 宋慧娟，2007，《清代中朝宗藩關係嬗變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 Song, Huijuan. 2007. *Qingdai zhong-chao zongfan guanxi shanbian yanjiu*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as Suzerain and Vassal State during Qing Dynasty].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 亞洲經濟，2017，〈韓中關係 새 時代 強調한 文大統領〉，<http://www.ajunews.com/view/20171213144040645>，查閱時間: 2017/12/14。Aju News. 2017. “Han-jung gwangye sae sidae gangjohan Mun daetongnyeong” [President Moon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China in the New Era]. (Accessed on December 14, 2017).
- 吳政緯，2015，《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台北：秀威。Wu, Cheng-wei. 2015. *Juanjuan mingchao: chaoxian shiren de zhongguo lunshu yu wenhua xintai: (1600-1800)*. [Recounting Ming Story in Choson].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 金信（김신），2015，《翱翔在祖國的天空》，台北：藍海創意文化。Kim, Sin. 2013. *Aoxiang zai zuguo de tiankong* [Flying through the Homeland Sky]. Taipei: Blue Ocean Corporation.
- 徐方清，2013，〈朴槿惠：先做朋友後做生意〉，《中國新聞週刊》，24: 70-72。Xu, Fangqing. 2013. “Piaojinhui: Xianzuo pengyou houzuo shengyi” [Park Geun-Hye: Friendshi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usiness]. *China Newsweek*, 24: 70-72.
- 邵磊，2013，〈對韓國語言文字政策的回顧與展望〉，《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127: 22-33。Shao, Lei. 2013. “Dui hanguo yuyan wenzi zhengce de huigu yu zhanwang”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Korea’s Language Policy]. *Sociology of Ethnicity*, 127: 22-33.
- 孫衛國，2002，〈論事大主義與朝鮮王朝對明關係〉，《南開學報》，4: 66-72。Sun, Weiguo. 2002. “Lun shida zhuyi yu chaoxian wangchao dui ming guanxi” [The Shida Principl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Chosen in the Ming Dynasty]. *Nankai Journal*, 4: 66-72.
- 孫衛國，2014，〈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的核心理念及其歷史演變〉，《韓

- 國研究論叢》，28(2): 140-160。Sun, Weiguo. 2014. “Chaoxian wangchao ‘xiao zhonghua’ sixiang de hexin linian jiqi lishi yanbian [On the Core Ideas of Korean ‘Little China’ Thought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Collected Papers for Korean Studies*, 28(2): 140-160.
- 陳放，2012，〈朝鮮與女真、滿族諸政權關係變遷研究〉，延吉：延邊大學博士論文。Chen, Fang. 2012. *Chaoxian yu Nuzhen Manzu zhu zhengquan guanxi bianqian yanjiu* [Study on Political Powers Relational Transition between Korea and Both of Joseon and Manchu]. Yanji: Ph.D. Dissertation, Yanbian University.
- 楊仕樂，2017，〈東亞朝貢體系的實證檢驗：朝鮮的案例研究：1618-1637〉，《問題與研究》，56(1): 1-27。Yang, Shih-yueh. 2017. “Dongya chaogong tixi de shizheng jianyan: chaoxian de anli yanjiu: 1618-1637”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East Asian Tribut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Korea 1618-1637]. *Wenti Yu Yanjiu*, 56(1): 1-27.
- 搜狐網，2013，〈世界觀：朴槿惠的漢語跟誰學的？〉，<http://news.sohu.com/s2013/shijieguan-397/>，查閱時間: 2016/02/28。Sohu.com. 2013. “Shijieguan: Piaojinhui de hanyu gen shui xue de?” [World View: Whom did Park Geun-Hye learn Chinese from?] (Accessed on February 28, 2016).
- 董向榮、王曉玲、李永春，2010，《韓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Dong, Xiangrong, Xiaoling Wang, and Yongchun Li. 2010. *Hanguoren xinmu zhong de zhongguo xingxiang* [China Image from the Eye of Korea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詹卓穎、傅濟功譯，盧泰愚（노태우）著，1988，《平凡人的偉大時代》，台北：黎明文化。Zhan, Zhuo-ying, and Ji-gong Fu trans., Tae-woo Roh. 1988. *Pingfanren de weida shidai* [The Great Era of An Ordinary Person]. Taipei: 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 鳳凰網，2015，〈如何從黑五類翻身？就是當上總統〉，<http://blog.ifeng.com/article/37476506.html>，查閱時間: 2016/02/28。Ifeng.com. 2015. “Ruhe cong heiwulei fanshen jiushi dangshang zongtong” [How to Change Your Social

Status? Become the President]. (Accessed on February 28, 2016).

- 劉銀萍，2000，〈韓國人的反美情緒與韓美關係〉，《中國研究》，19: 197-245。Liu, Yin-ping. 2000. "Hanguoren de fanmei qingxu yu hanmei guanxi" [Korean's Anti-Americanism and Korean-American Relation]. *Chinese Studies*, 19: 197-245.
- 劉德海，2009，〈變遷中的南韓中國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5(2): 1-35。Liu, De-Hai. 2009. "Bianqian zhong de nanhan zhongguo zhengce" [The Changing South Korea's China Policy].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 1-35.
- 裴京漢（배경한），2004，〈從韓國看的中華民國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Bae, Kyoung-han. 2004. *Cong hanguo kan de zhonghua minguo shi*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orea].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 羅敏球（나민구）、姜夢，2015，〈韓國總統朴槿惠2013年訪華演講的修辭分析〉，《修辭學》，22:35-68。Ra, Mingu, and Meng Jiang. 2015. "Hanguo zongtong Piaojinhui 2013nian fanghua yanjiang de xiuci fenxi" [A Rhetorical Analysis on Park Geun-Hye's Speech during her Visit to China in 2013]. *Rhetoric*, 22: 35-68.
- 蘇世岳，2010，〈韓國社會與文化〉，台北：新學林。Su, Shi-yue. 2010. *Hanguo shehui yu wenhua* [South Korea's Society and Culture]. Taipei: New Sharing.
- Fairbank, J. K. 1942.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Far Eastern Quarterly*, 1(2): 129-139.
- Fairbank, J. K. 1942.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Far Eastern Quarterly*, 1(2): 129-139.
- Fairbank, J. K. 1968.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ward, Susan. 2011. *Psychodynamic Counselling in a Nutshell*. London, UK: SAGE.
- Tikhonov, Vladimir. 2016. *Modern Korea and Its Others: Perceptions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Korean Modern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Zhao, Suisheng. 2004.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韓文文獻

- 郭鍾錫 (곽종석), 2001, 《某里紀行錄跋》, 韓國坡州: 景仁文化社。Gwak, Jong-seok. 2001. *Myeon-u seonsaeng munjip [Mr. Myeon-u's Anthology]*. Paju, Korea: Kyungin Publishing.
- 金履安 (김이안), 1999, 《三山齋集》, 韓國首爾: 民族文化推進會。Kim, I-an. 1999. *Samsanjae jip [Korea Anthology Series]*. Seoul, Korea: Korean Classics Research Institute.
- 金正剛 (김정강), 2002, 〈國漢混用은 곧 民族主體性이다〉, 《韓國論壇》, 158: 112-125。Kim, Jeong-gang. 2002. "Guk-han hunyongeon got minjok jucheseong ida" [Korean Mixed Script (Hangeul and Hanja) Manifests the Subjectivity of Korea]. *Monthly Korea Journal*, 158: 112-125.
- 金俊燁 (김준엽), 1963, 《中國最近世史》, 韓國斗山: 東亞出版社。Kim, Jun-yeop. 1963. *Jungguk choigeunse sa [China's Modern History]*. Doosan, Korea: Dong-A Publishing.
- 金珍鎬 (김진호), 2013, 〈朴槿惠政府時代의 韓中關係〉, 韓國平和研究會學術會議論文集, 韓國: 平和研究會。Kim, Jin-ho. 2013. "Pakgeunhye jeongbu sidae e han-jung gwangye" [ROK-PRC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Pak Gen-hui Gover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2013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Korean Association. Korea: Korean Association of Peace Studies.
- 金漢權 (김한권), 2015, 〈韓中盟友論爭論的意義〉, 《China Watching》, 8: 1-4。Kim, Han-gwon. 2015. "Han-zhong mengyoulun zhenglun de yiyi" [The Debate on the Potential Sino-Korean Ally]. *China Watching*, 8: 1-4.
- 金漢權 (김한권), 2016, 〈北核, 中國의 戰略的立場과 誤算〉, <http://www.hankookilbo.com/v/56e9987f45d34dfaa55770af1bae4991>, 查閱

時間: 2016/02/28。"Bukhaek, jungguk e jeonryakjeok ipjang gwa osan"  
[North Korea's Nuclear Issue, China's Strategic Position and Miscalculation].  
(Accessed on February 28, 2016).

金興圭 (김흥규), 2013, 〈習近平時期 中國의 對韓半島 政策과 朴槿惠大  
統領 訪中의 意義〉, 《戰略研究》, 59: 193-225。Kim, Heung-gyu. 2013.  
"Seupgeunpyeong sigi jungguk e dae hanbando jeongchaek gwa Pakgeunhye  
daetongryeong bangjung e eyi"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 under the era of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Park's China visit].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59: 193-225.

東亞日報, 2014, 〈北을 東北四省에 編入할 생각있나? 習近平과 '南主導統  
一' 意見 나눠〉, <http://news.donga.com/3/all/20140108/60030903/1>, 查  
閱時間: 2016/02/28。Dong-a Ilbo. 2014/01/08. "Bukeul dongbuk saseong  
e pyeoniphil saenggak itna? Seupgeunpyeong gwa namjudo tong'il eygyeon  
nanwo" [Does China plan to annex North Korea as the fourth province of  
Northeast China? Park Geun-hye Discussed with Xi Jinping How South Korea  
Leads Unification]. (Accessed on February 28, 2016).

朴斗福 (박두복), 1999, 〈韓中關係: 課題和發展方向〉, 《國際問  
題》, 7: 63-70。Park, Du-bok. 1999. "Han-zhong guanxi: keti he fazhan  
fangxiang" [Korea-Chinese Relations: Issues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7: 63-70.

徐相文 (서상문), 2014, 〈中國의 對韓半島 政策의 持續과 變化〉, 《戰  
略研究》, 62: 65-103。Seo, Sang-mun. 2014. "Jungguk e dae hanbando  
jeongchaek e jisok gwa byeonhwa"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62: 65-103.

徐玉蘭 (서옥란), 2015, 〈韓國言論에 그려진 中國 이미지 研究〉, 《韓  
中人文學研究》, 46: 277-303。Seo, Ok-ran. 2015. "Hanguk eonron  
e geuryeojin jungguk imiji yeon'gu" [Image of China Cultivated by South  
Korean News]. *Studies of Chinese & Korean Humanities*, 46: 277-303.

- 孫準植 (손준식), 2013, 〈「兄弟之邦」에서 「兇地之邦」으로 : 大韓民國과 中華民國의 外交關係 (1948-1992)〉,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58: 27-53. Son, Jun-sik. 2013. "Hyeongje jibang eseo hyungjijibang euro: Daehanminguk gwa Junghwaminguk e oegyo gwangye (1948-1992)" [From Brothers to Enemies: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ROK & ROC (1948-1992)]. *Korean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58: 27-53.
- 李圭泰 (이규태), 2007, 《現代韓中關係論》, 韓國: 汎韓書籍株式會社. Lee, Gyu-tae. 2007. *Hyeondae han-jung gwangye ron* [Contemporary Korean-Chinese Relations]. Seoul, Korea: Bumhan Book Corp.
- 李相信 (이상신), 2011, 〈親中과 反美的 警戒〉, 《國際政治論叢》, 51 (4): 109-132. Lee, Sang-sin. 2011. "Chinjung gwa banmi e gyeonggye" [A Choice between Pro-China and Anti-America]. *The Kore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51 (4): 109-132.
- 全海宗 (전해중), 1966, 〈韓中朝貢關係考〉, 《東洋史學研究》, 1: 10-41. Jeon, Hae-jong. 1966. "Han-jong jogong gwangye go"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Asian Historical Studies*, 1: 10-41.
- 鄭鎔碩 (정용석), 2014, 〈輕薄的 親中輿論과 所信없는 朴槿惠外交〉, 《韓國論壇》, 297: 8-15. Jeong, Yong-seok. 2014. "Gyeongbakhan chinjung eoron gwa sosin eopneun Pakgeunhye oegyo" [Park Geun-hye's Frivolous Pro-China Opinions and Untruthfulness in Diplomacy]. *Monthly Korea Journal*, 297: 8-15.
- 鄭容和 (정용화), 2006, 〈朝鮮 朝貢體系의 認識과 活用〉, 《韓國政治外交史論叢》, 27(2): 5-31. Jeong, Yong-hwa. 2006. Joseon jogong cheje e insik gwa hwalyong [Tribute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of the Chosun Dynasty]. *Journal of Korean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History*, 27(2): 5-31.
- 鄭在浩 (정재호), 2011, 《中國의 浮上과 韓半島의 未來》, 大學出版文化院. Jeong, Jae-ho. 2011. *Jungguk e busang gwa hanbando e milae*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eoul, Korea: SNU Press.

鄭竣晔（정준오），2014，〈第六共和國 北方政策의 分析的 照明〉，韓國：高麗大學博士論文。Jeong, Jun-o. 2014. *Je 6 gonghwaguk bukbang jeongchaek e bunseokjeok jomyeong* [An Analytical Study on Roh Tae-woo Administration's Nordpolitik]. Seoul, Korea: Ph.D. Dissertation, Korea University.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1971，〈革命의 偉大한 首領 金日成同志의 主體의 語言思想〉，韓國平壤：社會科學出版社。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KASS. 1971. *Hyeongmyeong e uidaehan sureong Kim Ilseong dongji e juchejeok eoneo sasang* [Kim Il-sung's Juche Language Idea]. Pyeongyang, Kore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朝鮮日報，2018，〈外交部，來年初「中國局」新設推進〉，<https://m.news.naver.com/read.nhn?mode=LSD&mid=sec&sid1=100&oid=023&aid=0003415301>，查閱時間：2018/12/28。Chosun Ilbo. 2018. “Oegyobu, naeyeon cho ‘jungguk guk’ sinseol chujin” [ROK'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ill Establish the Bureau of China in the Early Next Year]. (Accessed on December 11, 2018).

崔鉛植（최연식），2007，〈朝貢體系의 變動과 朝鮮時代 中華一事大 觀念의 曲折〉，《韓國政治學會報》，41(1)：101-121。Choi, Yeon-sik. 2007. “Jogong cheje e byeondong gwa joseon sidae junghwa-sadae gwannyeom e guljeol” [Changes of Tribute System and Development of ‘Serving the Great’ Ideology in Chosun Dynasty].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1(1)：101-121.

洪德和（홍덕화），1998，〈2個의 中國과 實利外交〉，韓國首爾：自作 Academy出版。Hong, Deok-hwa. 1998. *Dugae e jungguk gwa silli Ogyo* [This China, That China]. Seoul, Korea: Jajak Academy Publishing.